

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一)



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綜覽

吳梓明、梁元生 主編

崇基學院宗教研究叢書

吳梓明、梁元生主編

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一輯

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綜覽

吳梓明、梁元生、李金強 編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1998

本書內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書名：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一輯：
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綜覽

主編：吳梓明、梁元生

編者：吳梓明、梁元生、李金強

執行編輯：王建慧

封面設計：王建慧，版權 ©1998 Townpress Limited

書本設計：Townpress Limited, 版權 ©1998 Townpress Limited

電話：(852) 2652 9216

圖文傳真：(852) 2637 7584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電話：(852) 2609 6477 / (852) 2609 6525

圖文傳真：(852) 2603 5280

排版：御印堂

承印：豪威印刷出版有限公司

版次：199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000本

I S B N : 962-8216-05-8

封面說明：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
照片版權 ©1998 Townpress Limited

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編輯委員會

主 編

吳梓明、梁元生

執行編輯

王建慧

顧問委員

章開沅教授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
主任

萬仁元先生

前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

柯樂智博士

美國中國研究學習中心主任

(Dr. Archie R. Crouch)

史瑪莉女士

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主任

(Ms. Martha Smalley)

馬愛德教授

美國三藩市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
究所所長

(Professor Edward Malatesta)

魏揚波博士

美國瑪利諾修會歷史研究計劃研究主任

(Dr. Jean-Paul Wiest)

魯珍晞教授

美國拉特格斯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

(Professor Jessie G. Lutz)

裴士丹教授

美國坎薩斯大學歷史系教授

(Professor Daniel H. Bays)

密北德教授

前加拿大約克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Professor Peter Mitchell)

序

1993年12月9日至11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舉辦了一個有關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的國際研討會。來自美國、加拿大、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等國家及地區的中外學者共六十多人參加。研討會除分別報道了中國教會大學檔案文獻在不同地區的分布及儲藏情況外，更廣泛地討論了有關如何整理檔案、利用史料及跟進研究等問題。研討會的論文已結集成書，並於1995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為了對中國基督教大學的歷史進行全面重建的工作，以及協助學者繼續跟進研究，學者在研討會上建議應聯繫中國大陸有關的圖書館及檔案館人員，共同出版一系列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文獻及檔案目錄，使學者更能掌握資料，按圖索驥，進行有關的跟蹤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吳梓明教授有見及此，隨即發起出版《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的計劃，並邀約歷史系梁元生教授攜手肩負重任。此項計劃其後更獲得美國亨利魯斯基金會 (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 Inc.) 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慷慨贊助出版經費，使這項工作得以順利推行。

《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的出版由於涉及包括十三間基督(新)教大學及三間羅馬天主教大學的檔案，工程是十分龐大的。自1950年以後，這些大學被迫結束或改組；其後中國政府實施大幅度的院、系調整政策，更破壞了教會大學的完整性及校舍風貌，以致教會大學檔案失去了固定的存放地方。在文革時期，教會大學的檔案一度被視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證據資料」，不少資料受到摧毀，保管人員受到批判，檔案卷宗也幾經遷移，流散於不同的地方。職是之故，現時有關教會大學的檔案，亦散存在國內不同的省、市的檔案館、圖書館，

或不同的大學和個別院校的檔案館或圖書館校史室中。總計而言，十六間基督教大學的檔案資料，約有超過五十多個不同的收藏點。

為便於開展出版《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的工作，我們選擇了一間國家檔案館、一間市檔案館、及兩間屬於個別院校的檔案館作為起步點。它們分別是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華中師範大學檔案館及華西醫科大學檔案館。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屬於國家級歷史檔案館，所收藏的檔案主要是中華民國時期中央政府機關的檔案，其中包括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檔案（1928—1949）。教育部檔案中，亦包括有關高等教育的法令、章則、報告、建議、視察、統計等；教育部視察教會學校報告、教會學校立案（系科調整）；教會大學教職員資格審查；學生成績、畢業證明等。由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位於南京，它亦完整地保存了私立金陵大學（共2,103卷）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共228卷）的全宗檔案。

上海市檔案館是全國省、市級檔案館中儲藏教會大學檔案最豐富的一所。由於是在上海市，它保存有位於上海市區附近的四間教會大學的檔案。它們是聖約翰大學（檔案時間跨度1879—1952，共1,787卷）、滬江大學（檔案時間跨度1906—1952，共1,113卷）、東吳大學（檔案時間跨度1915—1952，共509卷）及震旦大學（檔案時間跨度1903—1951，共1,249卷）。

華中師範大學也完整地保存了前華中大學檔案文獻共858卷，從最原始自1875年的資料至1951年的資料均有保存。該批檔案曾於1972年時移交湖北省檔案館。華中師範大學於1985年底向湖北省人民政府申請，要求將該檔案全宗移回大學。這項申請終於在1986年初獲省政府批准，現得以集中保存在華中師範大學檔案館內。

華西醫科大學檔案館亦儲藏有前華西協合大學檔案全宗共4,047卷（包括中文檔案1,471卷及英文檔案2,576卷），集中保存了華西協合大學自1904年至1951年的檔案、出版刊物及論文等文獻資料。該批資料原分別藏於四川省檔案館及成都市第一檔案館，1986年才移交給華西醫科大學檔案館內保存。

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不單只是近代中國教育發展史中一個重要的

部分，也是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的環節。教會大學的歷史研究，可牽涉到一些大題目如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西關係發展史，也可以涉及學制、課程改革、地方傳統、菁英培養及教員、學生、校友等有關研究課題。這些課題並非囿於宗教或教育範圍之內，而是與近代中國的社會、文化，乃至經濟、政治，都有密切相連的關係。為了幫助學者掌握充足的資料，進行認真客觀的研究，我們認為最基礎的工夫就是要對這些教會大學檔案進行全面整理，釐清其分布及儲藏情況，認識其具體內容。故此，檔案文獻目錄的出版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批文獻目錄共分五冊出版，並不能囊括所有教會大學的檔案資料。我們計劃先從以上幾冊開始，盼望能帶出啟發及範例的作用，激發其他的檔案館、圖書館或校史室陸續出版有關教會大學的檔案文獻目錄，供學者們使用。

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崇基學院一向繼承中國十三間基督教大學的辦學傳統，在五十年代以來，當國內教會大學隱入歷史期間，它卻在外秉承基督教大學的精神，發揚潛德之幽光，使命巨大。是項出版計劃的部分經費，雖已獲得美國亨利魯斯基金會的贊助，促使初步籌劃的工作得以順利展開；但由於出版經費龐大，仍有賴崇基學院的慷慨支持，贊助不足的出版經費，乃底於成。謹此衷心銘謝。我們謹將這套書獻給母校作為「崇基學院宗教研究叢書」第一種出版，以為紀念。今年崇基學院更剛剛成立了「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順理成章，這套書便由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出版了。

1995年春，華中師範大學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主任章開沅教授曾應邀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擔任「黃林秀蓮訪問學人」後，繼續留港從事有關教會大學史的研究，我們也趁此難得機會，恭請章教授揮筆為此書作序。喜蒙俯允餽贈鴻文，謹亦致以萬二分謝意。最後，我們要感謝各位顧問委員。此書每輯我們均邀請其中兩位顧問委員擔任學術評審工作，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以深切謝意。

吳梓明、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一九九七年九月

章序

《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即將陸續出版問世，這是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進程中的一件大事。香港中文大學吳梓明教授囑我寫序，下面想談談自己的若干感受。

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在大陸起步甚晚。記得是在1985年春天，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劉子健教授到我們學校（華中師範大學）訪問，在海闊天空的聚談中偶然提及研究教會大學史的必要。由於我們都曾在教會大學（燕京大學、金陵大學）讀過書，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很容易取得共識。不過，他突然提出一個建議，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看你就是帶頭研究的最適合的人選。」心直口快的子健兄又作驚人之語。他見我茫然不解，便接著解釋說：「第一，你原來是教會大學的學生，現在的工作單位前身也是教會大學〔華中大學〕，對教會大學有較多親身的體驗。第二，你現在是大學校長，對學校有總體的把握，比一般人更有利於研究教會大學。第三，特別是作為歷史學者，你既有這方面的專業訓練，更有責任來填補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這塊空缺。」這次見面可以說是我決意投入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發端。

由於學校行政事務繁重，特別是1986年海內外展開的「孫中山先生研究熱」（該年乃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二十週年），使我不得不奔走於密集的中外學術交流活動之間，沒有餘暇和餘力從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唯一一件可圈可點的事，便是在湖北省一位開明負責人的支持下，把原華中大學的全部檔案從湖北省檔案館搬遷回來，由學校檔案室（現為檔案館）精心保管、整理，並開放供中外學者利用。這樣便為

此後的華中大學研究與韋卓民研究創造了條件，同時也或多或少為國內教會大學史的研究開了風氣。

不過1986年劉子健教授和林蔚教授(Professor Arthur Waldron)等普林斯頓歷史系同仁的工作，卻是極端認真且卓有成效的。他們擬訂了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項目計劃，並且獲得了美國亨利魯斯基金會(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 Inc.)的及時資助。1987年春，林蔚和我們一起在成都四川大學召開了一次小型的工作會議，把國內有興趣從事此項研究的學校與學者初步聯絡起來，並且對如何加強此項研究略作規劃與協調。3月的成都陰雨連綿，但學者的熱情戰勝了天氣的寒冷。此次聚會的積極回應，便是1989年6月1日至3日的首次國際研討會如期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舉行，並於會後出版了題為《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的論文集。與會者雖然只有四十餘人，但這畢竟是不同國籍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者在中國內陸城市的第一次學術交流，並且從一開始便具有平實而又超越的新的學術風貌。所以，吳梓明教授多次稱之為「近代大陸研究中國教會大學歷史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儘管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在中國和世界上發生那麼多重大事件，但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卻如同一條寂靜的小溪，不斷蜿蜒前行。沒有轟動，並非輝煌，卻紮紮實實地、鏗而不捨地向前行進。1990年、1991年連續兩次在美國紐黑文(New Haven)舉行有北美、歐洲、中國學者參加的國際研討會，提交會議的論文已經結集付梓(英文版)。1991年6月1日至3日又在南京師範大學舉行「教會大學和中國教育的現代化」國際研討會，教會大學史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均有所拓展。其後便是1993年10月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舉辦的「韋卓民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1993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舉辦的「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國際研討會，以及1994年5月在成都四川大學舉行的「教會大學與中國現代化」國際研討會。以上這些會議的論文，都先後分別結集付梓。同時還有一批專著資料匯編出版，也從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新進展。特別值得提出的是，1994年3月在台北舉行的「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不僅有一組研究教會學校的文章，而且還有六位大陸學者提交了論文。今年2月，此

次會議的主持者林治平教授又特地訪問了設於華中師範大學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在此前南京、香港兩次研討會，亦均有台灣學者參加。我們相信，兩岸三地中國學者的密切合作，必將有力地主導和推動業已國際化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

回想從1985年春劉子健教授建議到今天，已經整整有十年了。他雖然於1990年退休而且常在病中，但仍然非常關心此項研究，並盡可能參加我們的一些研討會。子健兄不幸於1993年初冬病逝，我覺得有必要在這裏感謝他的鼓勵與支持；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現今的持續發展，也可以告慰於他的在天之靈。

然而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畢竟還是初步的，很有限度的，因為它仍是一個比較年輕的並非很受重視的史學分枝。早在五十年代，中國基督教大學校董聯合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後來改名為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雖曾編輯出版了一套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系列叢書，分別記述了該會所曾支持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學中的十所的歷史，但主要是為了保存這些學校的興辦、發展直至結束的史事，以免湮滅，談不上深入的學術研究。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相關學校(如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杭州大學、華西醫科大學等)也編寫出版了一批校史，然而只有介紹這些學校的基督教大學前身的前後歷史淵源，甚至還保持著若干傳統的成見。所以迄今為止，把中國教會大學作為一個整體的學術專著，仍然是魯珍晞教授(Professor Jessie G. Lutz)的《中國教會大學史》(*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一枝獨秀。九十年代以來雖然已有一批較具學術水準的論著出版，但大多數限於單個時區、學校、人物的個案研究，有些仍側重於若干史事的陳述。所以如此，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而史料(尤其是檔案文獻)的分散與不易訪求，則往往使研究者淺嘗輒止甚至知難而退。

檔案文獻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早已為海內外學者所深知。為了與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倡導中國教會史研究相呼應，劉廣京(Liu Kwang-ching)早在六十年代初即已編輯出版了《美國人與中國人

——歷史論文與文獻》(*Americans and Chinese: A Historical Essay and Bibli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最先介紹有關中國基督教檔案文獻在美國的收藏情況。1989年出版柯樂智(Archie Crouch)等所編的《基督教在中國——美國圖書館和檔案室收藏文獻資料學者導引》(*Christianity in China: A Scholars' Guide to Resources in the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onk: M. E. Sharpe, Inc., 1989)，搜羅更為豐富完備，堪稱此類工具書的巨擘。這些工具書和正在進行的各項目錄索引工作，對於中國教會史的研究誠然提供了許多方便，但畢竟無法涵蓋汗牛充棟而且分散於海內外的中國教會大學檔案文獻。有鑒於此，在吳梓明教授的精心策劃下，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於1993年12月率先舉辦了「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國際研討會，對各地資料的收藏、整理、開放有關資訊作了廣泛而又密集的交流，同時也就如何利用教會大學檔案文獻問題進行深入討論。此次會議的特色之一，就是有一大批檔案館、圖書館的負責人與專業人士熱心參加。他們與歷史學者通過坦率而又懇摯的直接對話，加強了彼此之間的理解與合作。因此，作為會議的一項重要跟進工作，便是由吳梓明教授主持，出版這套大型的比較完整的書：《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

中國教會大學檔案文獻集中收藏於外國者，以數量之大與管理之善而論，當然首推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的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s)。其主要相關收藏，是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轉交的前「中國基督教大學校董聯合會」的歷史全宗，包括它所支持的十三所教會大學。此外，還有從六十年代末開始營建的「中國文獻項目」(China Records Project,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Collection)，專門收藏1949年以前長期在中國工作的美國傳教士的檔案文獻，其中有些個人卷宗與教會大學關係密切，而像《貝德士文獻》(Bates' Papers)則幾乎可以看作是中國教會大學檔案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批卷帙浩繁的檔案文獻經過史瑪莉女士(M. L. Smalley)十餘年如一日的苦心經營，已經陸續編成一批專檔目錄索引，一般包括大事年表、檔案全宗概述、分類檔案目錄三個組成部分，非常便於查閱

檢索。現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的學者，特別是內地許多檔案館、圖書館工作人員，已經高度重視並積極投入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檔案目錄索引的編製。他們努力的成果，必將為海內外從事此項課題研究的學者提供更多的方便。

從《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即將陸續出版的六本工具書（包括一本綜覽和五種目錄）看來，十三所教會大學的歷史檔案雖然歷經戰亂與收藏機構變遷，但至今所保存者數量仍極驚人，內容尤其豐富。即以我所比較熟悉的華中大學檔案全宗而言，現收藏於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檔案館者共858卷，檔案材料產生的最早年代是1875年（文華書院時期），止於1951年，即改為公立華中大學以前。其文字材料包括歷年校長報告書與文、理、教育學院報告書；學則及各項規章制度；各類會議記錄；韋卓民等與中外團體、人士的往來信函；有關宗教團體活動的報告、會議備忘錄；有關房地產方面的來往函件、契約、地形圖；有關經費、儀器設備方面的各種帳冊及登記表；教職員履歷表、名單、名冊；學生各類情況統計表、名冊、成績單；教學管理各類材料；學生畢業論文；教師編寫的教材與論著；各類刊物；各科試卷；政府有關訓令、指令（1932—1948）等等。此外，還有各個時期的圖表、照片，為數甚多。如果把《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三輯：華中師範大學檔案館館藏資料》與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所編的《華中大學檔案目錄》，以及耶魯大學圖書館的《雅禮協會檔案目錄》三者結合起來使用，則資料大體堪稱完備。

使我很受鼓舞的是，以收藏1949年以前民國檔案最多而為中外學者矚目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也參與了我們的工作，由萬仁元副館長（萬副館長已於1995年正式退休）親自策劃，並由鄺玉明先生擔任編撰之《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二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資料》。這部目錄除包括金陵大學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這兩所姐妹學校的檔案全宗以外，還有教育部相關檔案的目錄，分歸教育部視察教會學校報告、教會學校立案（系科調整）、社教工作計劃報告、教會大學教職員資格審查、教職員獎助學金、學生膳費代金、呈報科目表、招生簡章、學生畢業證明、學生軍訓及教官任免、購運教學用品申請免稅等

十一類。上海市檔案館亦為收藏特別豐富的資料庫，該館正在編製的《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第六輯：上海市檔案館館藏資料》，涵蓋滬江大學檔案1,113卷、聖約翰大學檔案1,787卷、東吳大學法學院檔案509卷等。即此可見寧、滬兩地教會大學歷史檔案的豐富收藏如何引人入勝。

我常說資料工作是功德無量的善舉，可以大量減少學者的舟車之勞與訪求之煩。目錄索引工作亦屬此類善舉，它純為學者研究服務。但作為服務對象的學者也必須加以重視並善於利用，才可以收相得益彰之效。所謂「寶劍贈與烈士，紅粉贈與佳人」，即是此意。而且，教會大學檔案的價值決非僅限於校史編寫，它更可供教育史、文化史、文化交流史（跨文化史）、社會史乃至學科（如社會學、新聞學、農經學、醫學、圖書館學等）發展史等多方面研究。

正如我十多年以前談辛亥革命研究那樣，「課題俯拾即是，只要勤加耕耘，即可望大有收獲」。在這裏，我想舉一個例證。近幾年中、日兩國許多學者正在研究「南京大屠殺」事件，田伯烈(H. J. Timerley)的《外國人目睹之日軍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New York: Modern Age Books, Inc., 1938)，是最早出版的，也是最為可信的一本檔案文獻結集。可是，由於考慮到資料提供者仍在日軍統治下的南京，為維護他們的人身安全而有意全部略去了姓名。這就給那些「南京大屠殺虛構論」者為貶低其可信性提供了空隙，他們甚至公然叫囂甚麼「沒有同時代的第一手材料」。忠實於歷史而且學風嚴謹如洞富雄先生，雖然非常重視田伯烈此書，但也由於考訂困難而難免張冠李戴，如把費吳生(George A. Fitch)逐日記錄日軍進城後暴行的長信誤認為是馬吉(John Magee)之類。其實，只要查閱教會大學相關檔案，就不難澄清上述的疑難。因為田伯烈當時是《曼徹斯特衛報》駐華記者，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美、英人士通力合作，共同向全世界揭露淪陷後的南京真相。田伯烈書中所著重提到的「南京一位最受尊敬、最有聲望、態度極為公正的外僑」，就是國際委員會的創建委員之一、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外國人目睹之日軍暴行》一書中所刊載的大量私人文件與國

際委員會文件，其原稿和副本大部分都保存在《貝德士文獻》中，由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保存。其中，還有一封貝德士於1938年4月12日從上海發出的密信（此信未經田伯烈刊布），內稱：「這裏正積極準備在英國和美國出版H. J. 田伯烈先生寫的一本書，作者是《曼徹斯特衛報》有經驗的記者，書名可能是《日軍在華暴行》。田伯烈先生是一位品格高尚的新聞工作者，他與北平、上海的基督教領導人長期保持密切關係。他保存著得自此間救濟團體的陳述中國戰爭實況的大量文獻。這些資料是以公正而具有建設性方式公布的。」並且自承，「儘管不能對這項工作承擔法律責任，但從一開始我便與它聯成一體，曾經參與商討計劃及其發展，也曾校閱全部文稿。此外，該書還有我在〔1937年〕12月15日起草的一份報告，那是為當時留在南京的許多新聞記者準備的。附件包括許多12月間我給日本使館的信件。其中也有我在〔1938年〕1月10日陳述過去數周南京陷於普遍恐怖狀況的信。給日本使館的信我雖未署名，但南京和上海（即或不包括東京）的日本官員心裏都很清楚，這些文件是出自我的手筆。史邁士博士（Dr. Lewis G. Smythe）由於曾在國際委員會秘書處發出的各種報告和案例上簽名，多少也受牽累……。因此，日本當局將有可能特別憎恨南京這個小小的外國人傳教士群體，尤其是我。費吳生先生由於其日記被引用，馬約翰〔即馬吉〕先生由於他的幾張照片被刊載，都將嚴重受牽累」。人們不難看出，只要把貝德士這些信件與田伯烈的書稍加對照，便可判定後者字字皆有根據，乃是有關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最早出版的第一部實錄。當然，田伯烈的書並沒有刊載貝德士所保存的全部相關檔案文獻，而且在時間上又只限於1938年2月以前，遠遠不能充分反映《貝德士文獻》的豐富內容。

南京大屠殺似乎只是一個政治事件，但南京安全區和國際救濟委員會的設立，與金陵大學董事長杭立武有關，而自始至終奮不顧身投入此項工作而且起骨幹作用的，除了貝德士外，還有金陵大學社會學系史邁士教授、大學醫院威爾遜醫生，以及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一批志願獻身的中外教員與職工。也正因為如此，在南京淪陷初期，金大和金女大校園便成為人數最多的難民營地。何況，即令在這

樣艱險繁忙的情況下，貝德士等人的辦學活動仍在繼續（1941年以前），難民營的宗教生活並未終止，而且他們還編寫了一套五冊的《中日戰爭對美國在華教育與慈善事業的影響》（*The Effects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on American Educational Philanthropic Enterprises in China*）（未正式出版，只作內部交流，其中一冊專寫教會大學）。所有上述這些文字材料都保存在《貝德士文獻》之中，而這些材料迄今仍未引起學者足夠的重視與利用。當然，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在一千多卷的《貝德士文獻》之中所佔比重極小，而對於整個教會大學檔案的豐富收藏而言更屬九牛一毛。回想三年前，我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系統閱讀檔案時，看到那些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的過路學者，真有點為他們感到惋惜。他們既然是專程前來搜集教會史或教會大學史資料，有些甚至是從萬里之外的異國他鄉趕來，但卻只能是浮光掠影地覆印或摘記少許相關資料而去，根本談不上潛心於爬梳剔抉。

時下學風日趨佻薄，不甚重視作為史學研究基礎的資料工作。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譬如商業化對於學術著作出版的衝擊，學位制度、職稱評審執行過程中的弊端等等，不能完全歸咎於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本身。但這種學風的頹敗對學術事業的殺傷力畢竟是很大的，大師型的學者與堪以流傳的著作出現甚少，多半與此有關。整個學術環境的改善，涉及各個方面工作的配合；但作為學者，本身自應嚴守學術規範，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而不應把一切過失都推諉於客觀現實。也正因為如此，我樂於推薦這套《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並期望它能為那些真正做學問的學者或多或少提供檢閱查索教會大學檔案文獻的方便。

章開沅

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一九九五年三月卅日

緒論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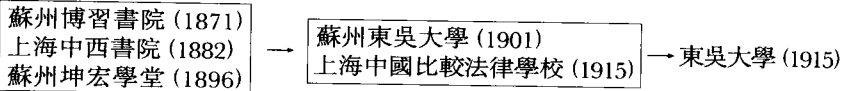
基督新教自1807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來華始，在中國展開傳教及教育工作已經接近兩個世紀。五口開埠之後，教育工作、社會救濟工作與傳教事業同步發展，由此可見，基督教在華辦學，已有一段悠長的歷史。但是早期基督教在華的教育工作，為宣教事業之附庸，並未有其獨立的教育理想與目的；而傳教士所辦之學校，亦以啟蒙義塾、初小學堂為主，旨在收養貧童、教書識字、導之入教而已。根據1868年出版之《教會新報》統計，1863年在華之教會學校約七十餘所，分布於各條約口岸之中：廣州：13間，汕頭：2間，廈門：7間，福州：7間，寧波：9間，上海：7間，煙台：1間，登州：2間，天津：5間，北京：2間，香港：8間。¹

如上所述，早期傳教士在華所辦的學校，多為義塾及小學，課程偏重於宗教，以傳教為主要目的。十九世紀下半葉，各口岸都市乃至內地城鎮，都有教會學校設立，校舍設施也漸具規模，課程由淺入深。更多的涉及宗教以外的科目，因為滿清政府推行洋務運動，西書與格致（科學）等課程益受重視。1877年在華傳教士在第一次的聯合會議上，已把基督教教育列為重要的議程。其時，全國教會學校數目已達463所，學生人數約近五千。²創辦山東登州文會館的美國傳教士狄考文 (Calvin W. Mateer) 在會議上發表了〈基督教會與教育的關係〉的文章，掀起了熱烈的討論。從1877年到十九世紀末，基督教教育有進一步的發展，18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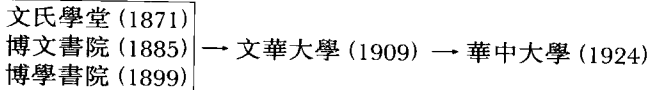
第二次全國傳教士會議上正式成立了「中國教育會」，為在華傳教士辦教育的第一個專業團體。教會學校學生人數到了1889年，已有16,836人。開辦教會高等學堂及大學的意念與行動，也在此時期肇其端。傅蘭雅(John Fryer)、丁隄良(W. A. P. Martin)、林樂知(Young J. Alle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及狄考文等，皆極欲在教會小學及中等學堂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建辦成高等學堂及大學。³

在他們的努力下，許多教會中學，在十九世紀末經過擴展、升格，逐漸成為高等學堂，具備了大學的雛型，再進一步發展成為四年制的大學，後又增設研究院課程。這個發展過程，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到二十世紀初完成，像狄考文於山東創辦的登州書院，1902年改制成為山東聯合大學，1931年遷到濟南，定名為齊魯大學。另一所是施約瑟(Samuel Schereschewsky)於1879年創辦的聖約翰書院，在1905年改名為上海聖約翰大學；還有，在1888年建立的北京匯文大學與1889年在通州建立的華北協和大學，於1919年亦合併為燕京大學；又1893年建立之杭州之江文理學院，於1914年升格為之江大學等，都是這發展基督教大學潮流下的結果。其他基督教大學由發展到定名，表列如下：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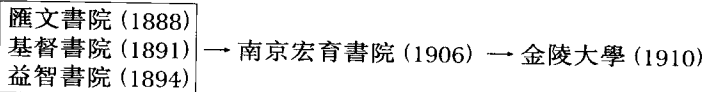
東吳大學



華中大學



金陵大學



華西協和大學

成都華西協和大學 (1910)

金陵女子大學

南京金陵女子大學 (1913) →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1930)